



瑶学丛书

主 编：奉恒高

副主编：梁 颖 何龙群 容本镇 玉时阶

瑶族“坐歌堂”的 结构与功能

——湘南盘瑶“冈介”活动研究

郑长天 著

民族出版社

YAOZUZUOGETANGDE
JIEGOUYUGONGNENG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瑶族“坐歌堂”
结构功能

的

——湘南盘瑶“冈介”活动研究

郑长天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郑长天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4

(瑶学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0009 - 5

I. 瑶… II. 郑… III. 瑶族—民歌—研究—湖南省
IV. J607.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72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67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009 - 5/J · 597 (汉 29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58130636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7YBB058)

《瑶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本丛书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

主 任：奉恒高

副主任：梁 颖 何龙群 容本镇

委 员：韦树关 玉时阶 何龙群 张有隼

奉恒高 范宏贵 梁 颖 容本镇

莫金山 俸代瑜 蓝怀昌

抢救瑶族文化遗产 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瑶学丛书”总序

在《瑶族通史》出版的同时，由广西民族学院组织编写的“瑶族丛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瑶族通史》和“瑶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是海内外瑶族同胞的一件大喜事，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光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遗产。从1998年以来，我们酝酿并着手编写《瑶族通史》，就是为了抢救瑶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其得以发扬光大。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本稿终于编写完成并出版，这是瑶族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那么，《瑶族通史》已经出版了，怎么还要编纂出版“瑶学丛书”呢？应该说，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早在编写《瑶族通史》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只因当时考虑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原因，此事就搁下了。因此，编写丛书绝不是凭主观愿望或一时感情的冲动，而是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根据瑶族研究的状况以及需要和可能而提出来的。

编写“瑶学丛书”是国内外瑶族同胞，特别是从事瑶学研究的

专家、学者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丰富，一向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在编写通史的时候，曾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整理瑶族历史文化资料，进一步弄清了瑶族的族源、瑶族的形成和发展等历史问题，为编写好通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科学依据。但是，瑶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通史中只能从整体上进行叙述，通史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贯通古今，突出一个“通”字，能“通”方方面面。而瑶族支系复杂，各支系的独特传统文化受《瑶族通史》篇幅的限制，难以全面、系统地编写进去。因此，要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好瑶族各支系的历史文化以及历史上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并编纂出版，留给后人，就要通过编写“瑶学丛书”来完成。我们编纂出版“瑶学丛书”，主要考虑在编写《瑶族通史》的基础上，对瑶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进一步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搜集、整理，对各个学术专题开展研究，重点是对各支系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使瑶学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初步建立完整的瑶学科学体系。同时，我们还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在学术上有造诣、有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年事已高，瑶学研究有待培养后继人才。因此，通过编写丛书，无论是对抢救瑶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培养瑶学研究人才，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继承、弘扬瑶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激励瑶族后人的需要。瑶族人口多，分布广。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瑶族人口达320多万人，其中中国瑶族人口263万余人，分布在我国南方的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6个省区的134个县（市）内，居住非常分散。那么，我们瑶族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分散格局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先秦开始，瑶族先民就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歧视，因而被迫走上了不断迁徙的坎坷道路，受尽了人间苦难，被迫进入高山密林，使一部分瑶人吃尽一山又过一山，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直到

◇抢救瑶族文化遗产 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定居下来。但瑶族是一个具有坚忍不拔精神的民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战天斗地，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保持了民族的特点和活力，发展了自己，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总结、弘扬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需要。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居住在国外的瑶族有60多万人，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住在越南、美国和泰国等地的人口较多。据有关调查资料反映，这些瑶族都是明、清以后陆续从中国迁徙出去的。他们在血缘、文化和思想感情上与国内各支系瑶族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居住在国外的瑶胞也非常关心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常回国寻根问祖，旅游参观，频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互访活动。因此，在编写好《瑶族通史》的同时，编好丛书，让海外瑶胞了解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这对促进国内外瑶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瑶学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加上“文革”期间工作上的失误，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代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现在党中央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对瑶族地区是个难得的机遇和挑战。组织专家、学者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将研究成果纳入“瑶学丛书”的出版计划，这对指导瑶族地区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瑶族人民尽快走上富裕之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文化书籍……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因此，有组织、有领导地编写“瑶学丛书”，抢救瑶族文化遗产，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举措。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这是为瑶族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本丛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安排的课题，得到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重视和支持，瑶学的专家、学者不仅有瑶族，还有汉族和壮族等其他民族，大家都踊跃撰稿，体现了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民族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秦恒高

2005年12月19日于南宁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序

长天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即将付梓，作为导师，自然颇为欣喜，也乐意为之说几句。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湘南瑶族“冈介”活动研究》。“冈介”是当地一种主要在室内进行的民歌演唱（对歌）活动。论题立足于对以往歌谣研究的反思。

序

现代民间文学肇始于歌谣学运动。1918年2月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第六十一号上刊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同时发表了蔡元培的《校长启事》，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转载了《简章》全文。大批征集歌谣由《北京大学日刊》发表。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北大歌谣研究会乃归入国学门，同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现代民间文学的调查与研究之所以以歌谣为突破口，大概有这样一些因由：首先是歌唱是流传最为广泛的民间行为，无须舞台，也不必腾出专门的时间。其次，歌唱活动最富有抒情意味和感染气氛。第三，与“五四”新文学倡导白话新诗有关。中国古代诗学发达，对古代文人而言，成就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诗。相应的，在民间，歌唱活动则最能显示生活魅力。诗来自歌，以“诗歌”并列，意谓于此。

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歌谣征集活动中，北京大学的学者们认为，

歌谣必须用方言词语和方言语音来记录才能不失其真。沈兼士在《段砚斋杂文·今后研究方言新趋势》一文中说：“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歌谣里所用词语，多少是带有地域性的，倘使研究歌谣而忽略了方言，歌谣中的意思、情趣、音调至少有一部分的损失，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强调歌谣记录文本应该保留歌唱的地域风格。但这种记录追求仅仅是宥于歌谣为纯粹的艺术表演的认识。歌谣学运动的影响贯穿了20世纪上半叶，发掘歌谣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成为其始终的核心。显然，这一学术取向受到了传统诗学的深刻影响。另外，歌谣被确立为单纯的文学形式，并且从其生存环境中抽离出来，遭到字、词、句的肢解和审美形态的剖析。

于是，歌谣凝练为“作品”，脱离了生活的存在而进入到学术的殿堂。正如美国美学学者所言：“我们现存的美的艺术品被移入和储存于其中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说明了实行艺术隔离、而不是发现它作为寺庙、广场的附属物 and 与生活发生关联的其他形式的部分原因……。”“而它们与普通生活的隔离，反映出它们不是本地的和自发的文化中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就有了“日常经验和审美经验之间的裂隙，就有了在真实世界中积极实践的生活与从那个世界中逃进博物馆、剧院或音乐厅的被沉思的艺术之间的鸿沟。”本来，歌谣始终不存在这种鸿沟，原因就在于它永远是属于一个特定群体的。歌谣流传于群体场合和群体生活之中。以往歌谣学存在明显的缺陷，极大地制约了现代歌谣学的学术视野和发展空间。

长天同学的博士论文针对这一缺陷，开辟了一条新的歌谣学路径，即在歌谣原本的生存环境中考察歌谣的生存状况。于是，在论文中，没有了“抽象”的歌谣，歌谣还原为“坐歌堂”的表演形式，还原为冈介的民俗行为，还原为民间生活。

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重要趋势，也应该是民间文学学科努力的方向。这里的生活世界并非胡塞尔通过回归前科学和前逻辑的生活世界而重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也不是海德格尔致力于

批判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层异化，而是指我们现在正在经营和实践的文化与生活的世界。歌谣学回归生活世界，就是进入歌谣演唱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视阈。美国民族志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邓尼斯·泰得洛克（Dennes Tedlock）曾调查了祖尼印第安人的口传诗歌，描述当地诗歌演唱的“声音”状态，诸如音调、旋律、停顿、音量、节奏等等，面对的是“声音”，记录下来的也是“声音”，而不是以往被切割了的“内容”。他的这种研究被称为“声音的再发现”。

就歌谣学而言，这就是摒弃记录文本而直接对处于“声音”和演说状态的歌谣进行研究。由于长天同学并不通晓瑶语，不能直接面对“坐歌堂”对歌声进行学术书写。尽管如此，他的学术立场超越了对“坐歌堂”的文学、艺术传统抑或口头传统的理解，以生活传统的视角进入其所考察的歌唱世界，把传统的冈介活动理解为一种生活形态的存在，或者说，在生活世界的层面理解冈介活动。正如他自己所言：“本文从民间文学立场对‘冈介’这一湘南瑶族的歌堂活动进行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将其还原到‘生活文化’中或‘生活层面’上，将其视为一个由多种经验互文而成的艺术化的生活文本，以突出该种民间文学活动的生活形态及其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

通过对实际生活状态的冈介活动的考察和论述，长天同学认识到交际和娱乐是其两个基本的社会生活功能结构。在交际方面，论文得出这样的结论：“‘冈介’向我们展示了地方社会在走亲戚的生活背景上出现的‘陪客’行为。在这种特殊的‘陪客’行为中，存在着由主家、客人、主方歌手、客方歌手、观众等活动主体构成的特定的角色交往结构以及相应的角色交往规范。对于前来‘陪客’的主方歌手的选择严格地体现出亲属禁忌的原则，而客人则经历一种仪式化的程序转变为客方歌手。无论是主方歌手还是客方歌手，无形中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各自的村寨共同体亦即是宗亲共同体，这使得他们的歌唱具有非个人化的共同体表述性质。在这

种仪式化的社交场合中，主家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联结主、客双方的中介，村寨里的观众也礼节性地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只有深入到冈介活动实际情境，观察表演者、表演者的表演以及表演者之间的仪式交往，从生活传统的学术立场把握冈介活动，将“坐歌堂”置于当地的聚落形态、交往方式、居住条件、婚姻制度以及娱乐生活等相关的社会语境之中，对冈介活动的生活功能的理解才能如此到位和准确。

在考察与论述的策略方面，论文吸纳了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之精髓。即将歌唱文本、表演状况和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看成是一个整体，不是以“坐歌堂”的演唱为中心，或者说其他因素不只是文本产生的情境或解释的上下文，而是各种因素呈现为“互为话语”的关系。“坐歌堂”表演的意义和效果是由现场的各种因素共同构筑起来的，各种因素之间表现为互动关系，这一学术路径体现的正是民间文学表演文本的“互文性”。于是，冈介被视为一种生活传统的文本，不仅指歌唱行为，也包括了通过歌唱的社会交际，以及和歌唱形成互文性关系的口头传统和社会背景。论文在回归生活世界方面是比较彻底的，可以说是表演理论在中国实践的成功范例。

“坐歌堂”是快乐的生活方式，长天同学对其的考察和研究也应该是快乐的，因为阅读这篇博士论文始终给人轻松和畅达的感觉。行文流利、表述富有感染力，研究方法的运用和观点的阐释节制有度，清晰又显现理论深度。这的确是一篇非常好读的论文。

作为导师，好话本不应多说，恐有溢美之嫌。论文中的不足反而需要说透。不过，相对于优点而言，缺点委实少些。论文的缺憾主要在于没有提供一次具体而完整的冈介活动“深度描写”的个案。

万建中

2008年3月31日夜于北师大塔三楼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一、关于选题	(1)
二、关于田野	(5)
三、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	(13)
四、论文框架	(23)
五、局限	(25)
第一章 冈介的地方性背景	(26)
第一节 冈介圈	(27)
一、五县六乡	(27)
二、交通与婚域	(31)
第二节 塔山瑶族乡	(36)
一、概况	(36)
二、族群历史：盘、赵二姓	(39)
三、聚落变迁	(48)
第二章 冈介的人际交往结构	(51)
第一节 冈介与走亲戚	(51)
第二节 作为中介的主家	(56)
一、场地：歌堂	(56)
二、主家的职责	(62)

三、“帮唱”	(66)
四、敬主与谢主	(67)
第三节 选择歌手的原则	(70)
一、性别相异	(70)
二、年龄相当	(72)
三、陌生原则	(73)
第四节 客人身份的转换	(77)
一、“请歌”与“劝歌”	(78)
二、转换仪式的内涵	(84)
第五节 村寨的歌手	(86)
一、歌手的人数	(86)
二、冈介中的共同体表述	(88)
第六节 观众	(96)
第三章 文本：传统的交际框架	(99)
第一节 冈介的文本构成	(100)
一、交流主题及其序列	(100)
二、韵歌与“水话”	(117)
三、口头传统中的歌书	(125)
第二节 冈介文本的模式化特征	(130)
一、稳定的主题序列	(131)
二、主题表述中的套路与古版	(134)
三、重叠的章句	(142)
第三节 冈介文本中的言情模式	(150)
一、言情的套路	(151)
二、缘分：欢聚与离愁	(161)
第四章 冈介的文化功能	(164)
第一节 娱乐	(164)
一、“解忧愁”：个体乐观主义	(165)
二、“热闹村”：消除匮乏的集体仪式	(169)

第二节 通婚·····	(174)
一、族内婚传统及其式微·····	(177)
二、聚落模式与婚域·····	(183)
三、婚姻落户方式·····	(185)
四、父母、媒人在通婚中的角色·····	(187)
五、冈介的言情性质：现实与象征的层面·····	(193)
第三节 冈介与庆神还愿·····	(207)
一、还盘王愿·····	(207)
二、冈介与“还愿歌堂”的互文关系·····	(216)
三、还愿仪式的衰落及其对冈介的影响·····	(234)
结 语·····	(238)
主要参考文献·····	(242)
附录一 歌与唱：民间文学的文本分层与意义间隔·····	(253)
一、歌：延续的传统·····	(255)
二、唱：意义的转换与失落·····	(258)
三、结论·····	(263)
附录二 地方精英视角：对盘文琇的一次访谈·····	(265)
附录三 西江村塘冲源赵姓房支谱系表（含婚域）·····	(283)
后 记·····	(289)

绪 论

本书以湘南瑶族地区一种被称为冈介（瑶语）的“坐歌堂”活动为研究对象，选取衡阳市常宁县塔山瑶族乡为田野调查范围，运用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力图通过对冈介活动的生活语境进行整体观照，并在此前提下相应地展开文本分析，从而较为全面地描述出冈介活动的结构与功能。本书不欲将冈介置于民间文学理论探讨的框架内加以表述，但我相信它作为一个极富代表性的个案，可以在更宽广的意义上提供一种对话的基础。

一、关于选题

我选择瑶族的歌堂活动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有一定的偶然性。在撰写开题报告前，我和导师万建中教授交流了自己在选题方向上的思路，当时我对互文性理论兴趣颇浓，想借助它来做民间文学文本观念方面的课题。但导师认为，对于博士论文来说，这一选题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在民间文学方面可能缺少足够的材料来支撑理论的表述，他建议我走向田野。事后我再三考虑导师的意见，并反思自己在细化研究提纲和查阅资料时遇到的困难，也觉得原先的课题设想确实存在着空疏之弊，非常容易陷入站在民间文学学科边缘说事的尴尬境地。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幸亏导师一语点醒。我决定尽快选择一个调查点，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到田野中

去印证。在大量地查阅湖南民间文化方面的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地方学者马铁鹰的《梅山文化概论》，并注意到其中描写的常宁瑶族的“谈笑”活动，虽然描述不足4页，但它确实在一瞬间呼应了我当时的理论趣向，使我觉得其中有很大的理论阐释空间。我设法通过电话和马铁鹰取得了联系，获知了他所描写的“谈笑”活动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相关信息，在经过多方面的权衡、考虑之后，最终选择常宁地区的“谈笑”即冈介活动为研究课题并作了开题论证。

在问题意识方面，支配我选择冈介为研究对象的内在动因则是自己对民间文学文本观念的理解。文本(text)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指称由书写而来的作品，而基于符号学和阐释学的文本则拥有更为广义的内涵，任何有意义的符号均可以成为文本。巴赫金认为，“没有文本，也就没有了研究和思维的对象”。^①不同的文本边界对于研究者而言，意味着不同的研究场域。对于文本的理解有多大的跨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存在空间。当然，对于实际的研究工作来说，任何分类都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建构，事实上，研究者在具体的文本解读过程中，很难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绝对单一的文本空间内，而只是表现出他的理论兴趣和学术侧重点。在一个学科的内部，各种文本观念的冲突由于学术诉求和价值判断的多样化而趋于正常并呈显活力，但是对每一个具体的研究者而言，结合自身的学术实践，厘定清晰的文本观念，确实能更明确地反映出他的对象体系和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文本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① 巴赫金：《文本问题》，见《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巴赫金把文本视为人文学科面对的“直接现实”或“第一性实体”。不过，他的文本概念并不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作品”，而是指宽泛意义上的“任何的连贯的符号综合体”，也就是说，包括书面的、口头的、造型的等等有意义的符号形式均可以成为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巴赫金认为，文本作为话语的“表述”，是一种包含了创造者、创造的形式和接受者在内的整体，是一个在交际中实现意义的过程。实际上，巴赫金的文本概念已经涵括了语境的内容。